

 城市与社会译丛

[英]彼得·柏克 著 刘君 译 刘耀春 校

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

十七世纪城市精英研究

VENICE & AMSTERDAM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城市与社会译丛

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

十七世纪城市精英研究

VENICE & AMSTERDAM

[英] 彼得·柏克 著 刘君 译 刘耀春 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十七世纪城市精英研究 /
(英) 柏克著; 刘君译, 刘耀春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08963-0

I. ①威… II. ①柏… ②刘… III. ①名人—
人物研究—欧洲—17 世纪 IV. ①K8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882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十七世纪城市精英研究
[英] 彼得·柏克 著 刘 君 译 刘耀春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8963-0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

定价: 32.00 元

Venice and Amsterdam: A Stud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lites

Second Edition

Copyright © Peter Burke, 1994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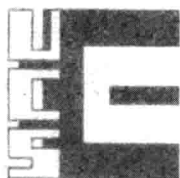
中文本根据政体出版社 1994 年版翻译

本译丛为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

规划项目



主编：孙 逊 陈 恒(执行)

编委：薛 毅 詹 丹 宋莉华 刘旭光 洪庆明

《城市与社会译丛》弁言

一、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城市的起源、发展、嬗变以及这一进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目前已出现了众多与这一领域相关的学科,如城市社会学、城市历史学、城市政治学、城市人类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城市气象学等。从广义上讲,上述学科都可以归入城市文化研究(Urban Culture Studies)这一范畴。可见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学科性,它综合各门人文科学的优势,吸收不同的观念与方法,以独特的视角研究城市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而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伴随这一进程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这一研究不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现实关怀的实际意义。因此,翻译一套城市文化研究丛书实属必要之举。

二、城市是一个个不断发展的文化载体,城市一经出现,其内涵也就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城市的诞生也就意味着城市文化的诞生,城市文化随着时代的嬗变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流光四射,因而研究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切入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放眼城市研究,比较成熟的研究属于城市社会学、城市历史学、城市人类学这三大学科,三者自然也就成为城市研究的三大支柱,这也是我们这套丛书选题所特别关注的。

三、根据我国城市研究的现状,拟将本丛书分为两个系列,即大学教材和专题研究,便于实际教学和深入研究。为了给广大读者奉献一套国内一流的城市与社会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最佳的译者”,以期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

专家学者,为中国城市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的城市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 者

2009 年 10 月 30 日

商人惯常将钱主要用于有利可图的事项；而纯粹的乡绅习惯把钱用在花销上。前者常常看着钱离开并带着利润返回；后者一旦钱离手则很少再指望看到它。习惯的不同自然影响了他们在所有事务上的脾气和禀性。商人通常敢作敢为；乡绅做事畏首畏尾……此外，商人经商自然养成的有条理、节俭和专注的习惯，使他更适合任何开拓性事业，并能获得利润和成功。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卷第四章

致 谢

x

撰写本书第一版时我欠下许多人情债。利华休姆信托基金会使我能够在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开展必要的研究,我在 1972 年成为该基金会“欧洲研究”的一名研究员。威尼斯国家档案馆(Archivio di Stato)与阿姆斯特丹市立档案馆(Gemeente Archief)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弗朗切斯卡·玛利亚·提埃坡罗(Francesca Maria Tiepolo)和已故的西蒙·哈特(Simon Hart)提供了建议、信息和鼓励。与以下诸君的讨论也使我获益良多:威尼斯的加埃塔诺·科齐(Gaetano Cozzi,本书经常引用他的著作)、曼彻斯特(大学)的布赖恩·普兰(Brian Pullan)、伦敦大学的克恩拉德·斯沃特(Koenrad Swart)、莱顿大学的伊沃·舍费尔(Ivo Schöffer)、剑桥大学已故的查尔斯·威尔森(Charles Wilson)以及我的朋友里卡尔多·斯坦纳(Riccardo Steiner)。我最初接触这一课题,是在萨塞克斯大学讲授一门有关“贵族和精英”的课程时,与选修该课程的学生们的讨论极大地澄清了我的思路。与威尼斯同行们的交流同样如此,他们是:比尔·布朗(Bill Brown)、亚历克斯·科万(Alex Cowan)、奥利弗·洛根(Oliver Logan)、爱德华·缪尔(Ed Muir)、吉姆·威廉森(Jim Williamson)。本书部分内容曾在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讲过,也在 1972 年皇家历史学会在牛津大学举办的“城市文明”学术会议上宣读过。事实证明,当时学者们提出的许多建议都大有帮助。约翰·黑尔(John Hale)、鲁珀特·威尔金森(Rupert Wilkinson)和毛里斯·坦普尔·史密斯(Maurice Temple Smith)阅读了本书的打印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改进意见。

在准备本书的第二版期间,最要感谢赫尔曼·勒登堡(Her-

xi man Roodenburg) 为我编写 1974 年以来有关阿姆斯特丹的一份研究书目。我也要感谢马里克·迈尔·德雷斯(Marijke Meier Drees)小姐馈赠她的学位论文;感谢鲁道夫·德克尔(Rudolf Dekker)、S. A. C. 杜多克·范·黑尔(S. A. C. Dudok van Heel)、弗洛里克·埃格蒙德(Florike Egmond)和莱昂纳德·福斯特(Leonard Foster)让我接触到荷兰社会和文化史的最新著作;感谢 H. 夸勒斯·范·于福德(H. Quarles van Ufford)提供有关阿姆斯特丹精英乡村地产的信息。1991 年,主题为“阿姆斯特丹:北方威尼斯”的展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当时组织的讲座和研讨会引发了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我也要感谢这些活动的组织者赠送我亨利·阿瓦尔(Henri Havard)的《阿姆斯特丹与威尼斯》(*Amsterdam et Venice*)。

第二版导言

xii

自我开始研究 17 世纪的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其间,已有大量关于这两座城市及其环境的书籍和文章问世。更重要的是,历史写作的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篇导论性文章旨在对这些变化(以及对本书第一版的反应)做些个人评论,我将依次讨论三个主题:比较研究法、精英研究以及人们有时所说的“新文化史”。

比较研究法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比较史当然并非什么新观念。在 20 世纪早些时候,一些历史学家,如比利时人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法国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德国人奥托·欣策(Otto Hintze)已在倡导并实践比较史,而一份专用于这一主题的刊物——《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也于 1958 年创刊并延续至今。我仍然相信这种历史研究路径的价值,并且基于本质上相同的理由。

首先,对关心某个特定社会(如尼德兰)的历史学家来说,将其与世界其他部分进行比较(和对照),会使他或她注意到那个社会某些(不做比较就可能被忽略的)特征,以及同样重要的,注意到某些重要的缺失。其次,比较在我们寻求解释时极有帮助。我写这本书(时值我讲授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个原因,就是想验证从维尔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到 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那些关注

xiii

目 录

插图目录.....	1
致谢.....	1
第二版导言.....	1
缩略语	17
第一章 精英研究	19
第二章 结 构	29
第三章 政治功能	50
第四章 经济基础	69
第五章 生活方式	88
第六章 训 练.....	102
第七章 态度和价值观.....	112
第八章 艺术赞助.....	129
第九章 从企业家到食利者.....	147
附录 阿姆斯特丹精英的投资.....	162
参考文献.....	164
索引.....	189

插图目录

1. 《威尼斯泄湖猎禽图》,选自 G. 弗兰克的《男女服饰》(G. Franco, *Habiti d'huomini e donne*, Venice, 1609),伦敦英国图书馆。/8
2. 《襁褓中两婴孩》,匿名,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9
3. 《威廉·范·隆画像》,D. D. 圣特福尔特(D. D. Santvoort)作,范·隆博物馆(Museum van loon)许可复制。/10
4. 《贡特斯泰因,费赫特河边的一座小别墅》,选自 D. 斯托彭达尔的《凯旋的费赫特河》(D. Stopendaal, *De Zegepralende Vecht*, Amsterdam 1719),海牙国家遗产保护博物馆(Rijksdienst v. d. Monumentenzorg)。/100
5. 《威尼斯的圣莫伊塞教堂》,伦敦曼塞尔(Mansell)收藏。/130
6. 《皮亚佐拉的孔塔里尼别墅》,选自 F. M. 皮乔利的《快乐的时钟》(F. M. Piccioli, *L'Orologio del piacere*, Piazzola, 1685),威尼斯柯雷尔博物馆(Museo Correr)。/131
7. 《阿姆斯特丹市政厅》,选自 18 世纪的一幅版画,伦敦曼塞尔收藏。/136
8. B. 凡·赫尔斯特(B. van Helst)绘制的《丹尼尔·贝尔纳德画像》,鹿特丹博伊曼斯·范·伯宁恩博物馆(Boymans-van Beuningen)许可复制。/143
9. 《穿官袍的监察官》,选自 G. 弗兰克的《男女服饰》,伦敦英国图书馆。/144

第二版导言

xii

自我开始研究 17 世纪的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其间,已有大量关于这两座城市及其环境的书籍和文章问世。更重要的是,历史写作的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篇导论性文章旨在对这些变化(以及对本书第一版的反应)做些个人评论,我将依次讨论三个主题:比较研究法、精英研究以及人们有时所说的“新文化史”。

比较研究法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比较史当然并非什么新观念。在 20 世纪早些时候,一些历史学家,如比利时人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法国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德国人奥托·欣策(Otto Hintze)已在倡导并实践比较史,而一份专用于这一主题的刊物——《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也于 1958 年创刊并延续至今。我仍然相信这种历史研究路径的价值,并且基于本质上相同的理由。

首先,对关心某个特定社会(如尼德兰)的历史学家来说,将其与世界其他部分进行比较(和对照),会使他或她注意到那个社会某些(不做比较就可能被忽略的)特征,以及同样重要的,注意到某些重要的缺失。其次,比较在我们寻求解释时极有帮助。我写这本书(时值我讲授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个原因,就是想验证从维尔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到 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那些关注

xiii

精英的社会理论家的结论。^①最近有一项关于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出色研究,按照该书作者的话说,比较历史分析使一种更缜密的研究路径成为可能,它事实上“充当了协调理论与历史的一种理想策略”^②。

我得承认,我期望比较史能获得较之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更大的关注和更迅速的发展。本书最初是我为出版商毛里斯·坦普尔·史密斯主编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该丛书包括一项对法国北部和日本封建制度的研究,一项对拜占庭和保加利亚的研究,以及一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列颠与美国的研究。^③这套丛书不了了之,主要是因为很难找到胜任的作者,在我试图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策划一套类似的丛书时遇到了同样的难题。

在其他地方也会遭遇这样的经历。甚至《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上刊登的文章一般也集中于某个地区,只是含蓄地比较。不过,还是有了一些变化的迹象。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转向(或更确切地说回归)历史而不放弃比较分析的兴趣,他们的大师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作了出色的示范。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正转向比较。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对两位敌对政治家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和奥利瓦雷斯(Olivares)伯爵的研究以及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对巫师安息日的研究,虽然无论主题还是风格都大相径庭,但均注重比较法,同时一项从比较的角度撰写尼德兰历史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④

xiv 比较研究的趋势在研究非洲和亚洲的史学家中尤为明显,这或许是他们比研究欧洲的专家更深地投入世界历史教学的缘故。新丛书“剑桥比较世界史研究”既显示又鼓励了这一趋势。如今,牛津大学近代史荣誉学院已经有一篇关于比较史的论文。比较史似乎终于从边缘

① 关于历史和社会理论的进一步反思,参见 Peter Burke (1992)。

② Skocpol (1979)。

③ Lewis (1974); Browing (1975); Snowman (1977)。

④ Elliot (1984); Ginzburg (1989); Davids et al (1988)。

进入了主流。

那么让我们期望,现在会有一位或一群史学家着手对欧洲及其各个地区进行一项更严肃的比较研究,写出一部欧洲东西南北文化差异的历史,内容从物质生活(橄榄油与黄油、葡萄酒与啤酒等)到家庭结构、宗教和政治文化不一而足。^① 这样一项研究将使我们能够判断,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关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著名对比,是不是应该被重新界定为西北欧与南欧和东欧的对比。^② 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比较和对照正是需要被置于这一广阔背景之下。

精英研究

在过去二十年中,对一般精英,特别是对城市显贵的研究,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史学家的关注,尤其是在意大利、德国和荷兰(在这里,多亏了已故的丹尼尔·J. 鲁尔达(Daniel J. Roorda),这个主题被纳入了莱顿大学的集体研究项目)。^③ 但除了詹姆斯·阿梅朗(James Amelang)对16、17世纪巴塞罗那的研究,研究显贵的文化和心态以及财富与权力的历史学家相对较少。^④ 这些有关精英的研究大都使用了计量方法,在个人计算机的时代这是可以想见的,他们的许多结论都是基于“群像研究”(prosopography),即一个社会群体的集体传记。计量研究法的一个好处是它便利了精英群体之间的比较。

xv

然而正如本书第一版已经提到的(见本书边码第11页),如何对用这些方法研究的群体进行界定仍然是有问题的。首先,分别拥有最

① 1992年,安东尼·毛察克(Antoni Mączak)和马尔腾·波拉(Maarten Prak)在巴黎组织了一个关于“14至18世纪欧洲不同地区间的关系演进”的研讨会。

② Macfarlane (1978)。(此书有中文译本:《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管可秣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译注)

③ 在许多可能的例子当中,参看集体著作《显贵》(Patriziati, 1978); Ehbrecht (1980); Tagliaferri (1984); Schilling & Diederiks (1985)。

④ Amelang (1986)。